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辛勤的培育　亲切的关怀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
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 …… 王首道（1）
回忆陈潭秋 …… 包惠僧（20）
赵世炎生平史料 …… （27）
幼年时期…… 中学时期……留法勤工俭学和在
苏联学习时期——在中国北方活动时期 …在
江浙地区活动时期
回忆张太雷 …… 包惠僧（137）
在上海的初次会见…… 在武汉重逢…… 在广州
的三年…… 在武汉政府时期
毛泽覃 …… 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146）
茁壮成长…… 烈火红心……奔向井冈…… 乔林
播火……泉江春雷……会师前后……踏遍青山
……斩断魔手…… 勇战逆流 …红星不灭
张子清生平 …… 蒋　杰整理（191）

辛勤的培育　亲切的关怀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

王首道

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这里曾经是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在这里的十三个峥嵘岁月中，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操劳，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时期内，我大部分时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有不少机会直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回想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如在眼前。这里，只就毛泽东同志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政策的伟大革命实践，作些片断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坚持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把革命干部作为党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同志处理干部问题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热情关怀严格要求的态度、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才能哺育出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也才能使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与正确的政治路线相适应的干部路线和一整套干部政策。在我党历史上的每次危急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力挽狂澜，使革命转败为胜，使局势转危为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路线，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是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一九三一年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那时，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疯狂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他们打着"反右"、"肃反"的旗号，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照搬苏联"格别乌"那套，大搞肃反神秘化、扩大化，造成"保卫局"凌驾于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之上的反常现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全国的红色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也深受其害。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的几个月里，王明路线当时在陕北的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搞得人人自危。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眼看这块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就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马克

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指引下，挽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从而使陕北成为党中央、毛主席长征胜利结束后的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党我军又从这里出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正当毛泽东同志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向毛泽东同志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杨森、杨奇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毛泽东同志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同志对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由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部署直罗镇战役，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我们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在下寺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是陕甘边区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边区保卫局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这些案卷，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据我们调查了解，刘志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即"渭华起义"，后来又到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迅速得到发展和巩固。一九三五年九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鄜县（即现在的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刘志丹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一个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对他所住过的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多少大锅，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起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右

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九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同志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和通讯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戴季英逮捕了。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刘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却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亲自访问了刘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有错误，组织上对这些错误进行审查是应该的。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由于没有经验，又缺少革命理论，与上级通讯联系也非常困难，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在工作中肯定会犯错误。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刘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对党中央充满着无限热爱和坚定信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革命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戴季英一个也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根据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调查了解到的大量材料，认为他们搞的那些案卷中列举的刘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

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爱国人士和不反对革命的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我们还陆续审查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时候，他们也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

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先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我们的看法，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对这些同志应予立即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同志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彻底平反的消息传出以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毛泽东同志对刘志丹同志说：你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恩来同志也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呢！毛泽东同志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心情十分激动。他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毛泽

东同志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任命刘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初，刘志丹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四月中旬，在山西三交镇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志丹同志的灵柩运回瓦窑堡时，周恩来同志亲自扶柩送葬。毛泽东同志亲自向志丹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一九四三年，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七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建陵墓。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刘志丹将军墓”的墓碑，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周恩来同志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题了词，对刘志丹同志表示深切的悼念，给予高度的评价。

二

在干部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从团结全党出发，搞五湖四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当时我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曾经产生过许多“山头”。这些“山头”在革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把各个“山头”的力量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在延安，就有来自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有来自一、二、四方面军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有来自白区地下党的干部，有各条战线的干部，还有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等等。尽管他们的斗争历史、工作经历、爱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特长、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但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指出：他们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的山头主义，在承认"山头"存在中团结"山头"并逐步削弱和消灭"山头"，使全党变成一体。因此，毛泽东同志对这些干部总是一视同仁，使他们各称其位，人尽其才。同时，毛泽东同志又不断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

使我深受教育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毛泽东同志对红四方面军问题的英明决定和正确处理。红四方面军是我们党领导下一支英雄的革命队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一度篡夺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推行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公然对抗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大搞军阀主义和惩办主义，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肆残害知识分子干部，把红四方面军作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红四方面军有极少数干部受张国焘的欺骗和蒙蔽，对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认识不清，对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理解不足，有的甚至同情和支持张国焘。这时，有的人以个别代替一般，错误地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主张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甚至企图用武力解决红四方面军的前线指挥部，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是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制止了种种错误的主张，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部队，不是某个人的队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好的，是英勇顽强的，以往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要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还亲切地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找他们谈话，帮助他们认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及其危害，号召四方面军

的广大干部战士以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都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为了使全党全军对这次路线斗争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采取了英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极大地团结和争取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彻底地孤立了张国焘以至后来他叛党逃跑时，连警卫员也没有跟他走。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是我们正确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团结绝大多数同志的极其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对广大干部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针锋相对。不论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是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都搞的是宗派主义。他们自立门户，结党营私，亲一部分，疏一部分，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千方百计置之于死地。毛泽东同志对于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谆谆教导我们，不但要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还要善于爱护干部、培养和提高干部；不但要关心党内的干部，还要关心党外的干部。在会上，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以及肖劲光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一九三八年农历的除夕，毛泽东同志盛情邀请张启龙、谭余保同志和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我们高兴地走进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的窑洞时，他立即放下工作，同我们亲切地握手，请我们坐下。毛泽东同志关切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我们一听，原来毛泽东同志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听说，毛泽东同志在全会闭幕后曾经同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在会上忘记把张启龙同志的平反问题也讲一下。今天，毛泽东同志又专门找我们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怎能不感到无比高兴呢！湘赣苏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和湘赣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使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苏维埃政权比较巩固。但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湘赣苏区，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左”的错误，苏维埃政权里面也混进了个别坏人。当省委对这些问题已经发现并正在纠正的时候，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陈洪时、刘士杰来了。他们全盘否定湘赣苏区过去的成绩和正确做法，一概诬指为“右倾保守”、“富农路线”，还大抓AB团，搞肃反扩大化，把一大批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省委、县委领导干部都当成“右倾机会主义”、AB团抓起来，关进保卫部门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安源工人出身的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同志、省委常委刘其凡同志等一批负责干部，都被他们无

他调到延安。后来，中央组织部正式决定撤销湘赣省委对他的处分。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还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我们无比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但我们是犯了'左'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泽东同志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中央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未得到平反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的、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后来，中央秘书处根据毛泽东同志这次谈话的精神，写了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批准发至全党，为张启龙同志彻底平反，安排工作。毛泽东同志对错案的平反，是那样的坚决彻底，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又是那样的无微不至，这不仅是对我们湘赣苏区干部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全党干部的关怀啊！

在毛泽东同志家，我们看看天快黑了，便起身告辞。他一定挽留我们一起吃"大年饭"。虽说是"大年饭"，但由于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质生活很困难，毛泽东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也只有极简单的饭菜，但我们吃起来是香喷喷的。尽管窑洞外正是风雪弥漫，我们坐在他的身边，却感到幸福和温暖……

毛泽东同志爱护干部、团结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一贯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看二帮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脚踢开还是教育挽救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分析这些同志犯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右派成立伪

中央时，当过伪中央“常委”，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思想负担很重，感到抬不起头来。她约了一位女同志陪她去见了毛泽东同志，对主席说：“主席，我在罗章龙路线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痛。”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教导她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泽东同志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沉重的思想负担，使她心境豁然开朗了，积极投入了工作。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能改正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如博古同志，原来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经过批评帮助，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痛改前非，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博古等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在黑茶山遇难。毛泽东同志在《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四八”烈士，其中也包括对博古同志的正确评价。

三

在我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在党中央到达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刚确立不久，同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同时又面临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严重政治局面。这时党的干部队伍还不足五万人，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高，有的同志还未能看清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看不清中国革命必胜的光明前途。干部队伍中的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适应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形势需要的。毛泽

东同志高瞻远瞩，把培养和教育干部作为党的重要的战斗任务，着重在反对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延安地区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也成批地成长起来。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一大批优秀干部像革命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使全党的工作为之面目一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抗战初期起，党中央、毛主席就在组织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蒋管区和敌占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等，作为培育革命干部的熔炉。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利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有利时机，领导和加强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会上讲话。当时延安工农干部多，他们过去学习机会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又很忙。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个情况指出：大家在学习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军事，学习文化。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觉得从此学习有了门路。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近一百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他的许多文章、报告、演讲、谈话，都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同陈独

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两条路线斗争经验，帮助干部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自觉性。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干部的头脑，他亲自主讲哲学，其中两节后来补充修改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同志的讲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时常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问题，如他把教条主义者比作庙宇里"八面威风"、"十分无用"的偶像，还比作终日挂在空中不踏实地的奇人，这些深刻的形象化的比喻是对王明一类主观主义者的有力鞭挞。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者把理论与空谈、吹牛混为一谈的主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啃教条、背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毛泽东同志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本背教条，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这样，他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

毛泽东同志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他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泽东同志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勉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一些通讯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泽东同志就说明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泽东同志谈话，都无不为毛泽东同志的崇高思想境界所鼓舞和伟大革命热情所感染。毛泽东同志对干部是严格要求的，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同志，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泽东同志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却答不上来。毛主席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

和豆瓣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泽东同志教育干部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在认真看书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等方面，他都是我们的光辉典范。对于自己的亲属，他也严格要求。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毛主席就要他打起背包到农民家里拜师，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你所学的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劳动大学，学习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

一九四〇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些指示是为后来延安整风和路线学习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在党内大量存在，加上抗战前后吸收的大批党员，也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总结、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原则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整风过程中，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阶级敌人，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

这次审查干部是完全必要的。党的干部队伍从抗战以来有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